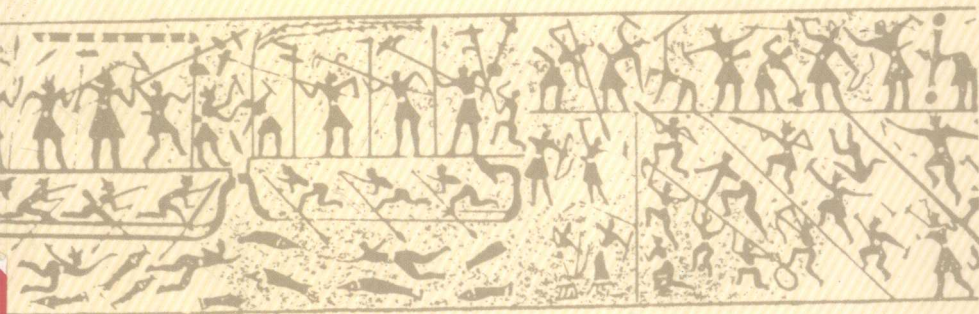


孙子兵法集注



黄朴民
赵海军
编校



岳麓书社

孙子兵法集注

黄朴民
赵海军

编校

岳麓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孙子兵法集注/黄朴民,赵海军校点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 2002

ISBN 7-80665-248-5

I. 孙… II. ①黄…②赵… III. 孙子兵法—注释
IV. E892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2036 号

责任编辑 曾德明

封面设计 胡 颖

孙子兵法集注

黄朴民 赵海军 校点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(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

200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1.125

字数:260 千字 印数:1—6,000

ISBN 7-80665-248-5
G·277 定价:1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

厂址:望城县高塘岭镇郭亮北路 69 号 邮编:410200

本社邮购电话:0731-8885616 邮编:410006

序

《孙子兵法》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，是阐述指导战争的普遍规律的兵书。其军事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，历代兵家奉之为圭臬。同时，《孙子兵法》还是一部出色的哲学著作，对中华民族乃至东方人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有着深刻的影响。今天在多种学科中有其深邃思想的显现，各行各业的人群中其警句脱口而出。《孙子兵法》的思想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范畴，超出了中国这块土地，超越了时空的界限。它是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人类的瑰宝，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。

《孙子兵法》一书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大军事家孙武所著。孙武是齐国人，祖上为齐王掇甲征战者代有人才。孙武在青少年时代受到齐国兵学的陶冶，及长齐国内乱，南下求仕。后在吴国为将军，吴王用他和伍子胥的谋略“西破强楚，北威齐晋，南服越人”（见《史记·伍子胥列传》），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战绩，使吴国得以称霸。孙武继承了齐国的兵学传统，经历过战争实践，将其经验教训升华，创作出《孙子兵法》这一光辉的理论著作。此书所阐述的战略思想和战争的普遍规律，对后世的战争具有指导意义。所以在成书不久的战国时代即已流传了。《韩非子·五蠹》记载：“境内皆言兵，藏孙、吴之书者家有之。”《战国策》、《吕氏春秋》也直接或间接地记载了孙武其人其事。至于《史记》记载最详，为孙武立传，叙述了他的经历，并明言他以“十三篇”兵法进见吴王阖庐，其情景栩栩

如生。以后《孙子兵法》一书在历代史书及公私目录书上著录不断,是流传有序的。史书中《汉书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宋史》、《明史》的《艺文志》和《隋书》、《旧唐书》的《经籍志》等均有著录。目录书中阮孝绪《七录》、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、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、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《崇文总目》、《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》等尽皆著录。

《孙子兵法》一书源远流长,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,历经文字的演变、版本的进步、注释的繁富等种种变化。从中可以看出《孙子兵法》一书受到历代王朝和人们的重视,普及范围和研究程度在不断扩大和深化,显示出经久不衰的活力。两汉时期出现了规范化的定本和第一个注释本。汉初,战争甫定,百废待兴,收集兵书为要务之一。其时,“张良、韩信序次兵法,凡百八十二家,删取要用,定著三十五家”。(见《汉书·艺文志》)汉武帝时,“军正杨仆拊摭遗逸,纪奏兵录,犹未能备”。颜师古注曰:“拊摭,谓拾取之。”这两次整理兵书重在收集,使得战乱残存和流失的兵书得以保存下来,《孙子兵法》亦在其中。汉成帝时,“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,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,太史令尹咸校数术,侍医李柱国校方技,每一书已,向辄条其篇目,撮其指意,录而奏之”。此次整理书籍重点在文字内容方面。任宏校勘兵书的文字,刘向则统一其篇名,排定其篇章次序,确定书名,撰写叙录,缮写定本,上奏皇帝,然后由国家收藏。上述刘向、任宏整理兵书事,在银雀山汉简中是有所印证的。汉简本《孙子兵法》至少早于刘向、任宏整理校勘兵书一百余年,还保持着不少早期形态,与定本有明显区别。例如:篇名有所不同,篇次有所不同,没有书名等。今天传世本《孙子兵法》的书名、篇名、篇次应当是刘向、任宏时排定的。他们确定的书名应即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的《吴孙子兵法》,这也就是后代称孙武书为《孙子》和《孙子兵法》的由来。汉代收集整理兵书对《孙子兵法》的保存与传世有很重要的作用。

东汉末,曹操为《孙子兵法》作注,所用底本为三卷本,阮孝绪《七录》亦三卷本,看来曹操所注当是刘向、任宏整理校勘的本子,即国家收藏的定本。曹操注释《孙子兵法》在序文中称“略解”,曹注本是传世的最早的注释本。曹操很推崇孙武及其兵法,其序曰:“吾观兵书战策多矣,孙武所著深矣。”曹操注《孙子兵法》缘起于“世人未之深亮训说,况文烦富,行于世者,失其旨要”。曹操此说甚是,自春秋晚期到东汉末年已历六七百年,其间社会制度经历了很大的变革,战争的规模、兵种、战术等都有变化发展,更为重要的是文字从六国文字演变为小篆、隶书。由于时代的变迁、文字的演变,人们为了解《孙子兵法》内容的真谛,势必要依靠注释的帮助。曹操有丰富的历史与文学知识、多年的战争经验,并且深通兵法,其注释《孙子兵法》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幸事。《孙子兵法》一书经曹操注释后,自然研读者多,传抄者众,从而更广泛地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。唐宋时,唐太宗、李靖在兵法方面的造诣很深,经常研讨兵法。唐太宗说:“朕观诸兵法,无出孙武。”此时,注释《孙子兵法》者渐多。宋朝时,多次降诏校定《孙子》、《吴子》等兵书。《孙子兵法》一书成为武学的必修科目,武举要考试“《孙》、《吴》、《六韬》大义”。(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)宋代为后世留下十分珍贵的孙子书有《魏武帝注孙子》、《武经七书·孙子》、《十一家注孙子》。唐宋时代官方重视,注释和翻刻弥多,《孙子兵法》一书广泛流传。

明清两代,明代较重视疏解,并带有一定的研究性质,如刘寅《武经七书直解》、赵本学《孙子书校解引类》较有代表性。清代偏重校勘,如孙星衍《孙子十家注》,对各家注文进行了考校,颇多可取之处。此书流传较广,影响也大。只是孙氏有心注《孙子兵法》而未能注,是为憾事。

《孙子兵法》一书成书于两千多年前,流传广泛,校注本也很多。1972年我主持发掘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,出土了汉简《孙

子兵法》和《孙臆兵法》，证实了历史上孙武和孙臆各有其人，各有兵法传世。这次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，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极大的重视和兴趣，推动了《孙子兵法》研究走向高潮。1989年全国性的学术团体“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”率先成立，带动和影响了国内外同类研究组织纷至沓来。同时，注释、研究、普及和应用《孙子兵法》的文章和书籍纷呈于世。这些著作数量多、内容多样，在质量上也大大超过前人。孙子之学蔚然而生，与儒学的研究交相辉映。今天研究《孙子兵法》的条件比前人优越许多，有些条件是前人所不具备的。我们能够继承历代研究的成果，吸取清代训诂学的成就，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新资料。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，在研究会的倡导和规划下，由我主编并与同好撰写了《孙子校释》一书，冀能补历史之缺憾于万一。

我就是在研究会的学术活动中得识黄朴民博士的，后在撰写《孙子校释》一书中，朴民亦是合著者之一。朴民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，尤其在儒学与兵学方面见长，著述丰厚，在中青年学者中位居前列。朴民笃实宽和，认真专注，在清苦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勤恳耕耘，不为外务所动，于今尤为难能可贵。今与赵海军同志一起，对历史上最重要的《孙子兵法》集注本进行认真的点校整理，这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，必将有益于《孙子兵法》研究事业的发展，对弘扬中国古代优秀军事文化起到积极的作用。故虽不善为文，却乐为此序，与朴民等共勉之。是为序。

吴九龙

2002年6月

《孙子》真伪、著录、版本及价值简论

《孙子》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,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其内容博大精深,思想深邃富赡,逻辑缜密严谨,文采典雅绚丽,问世以来,对中国古典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至为深远,被人们尊奉为“兵经”(《文心雕龙·程器》)、“百世谈兵之祖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)。直到今天,《孙子》的许多合理内核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泽,启迪着人们的智慧,对现代军事理论的建树和发展,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。与此同时,《孙子》的基本原则和思想方法,还超越了军事领域,在商业竞争、企业管理、体育竞技、外交谈判等社会活动中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应用。《孙子》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文化财富,它的影响早已越出国界,被译成英、法、俄、日、意、捷克、希腊、阿拉伯、越南、朝鲜、罗马尼亚、希伯莱等 20 余种文字,学习、研究和应用《孙子》的热潮盛久不衰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这部古老的兵书业已超越时空的界限而具有不朽的魅力。

那么,《孙子》究竟是怎样一部兵书?它的作者是何人?成书年代在何时?它为何诞生于古老的东方大地?它的著录和版本情况怎样?它的理论特色和思想价值体现在何处?如何认识和把握其历史地位和影响?本着向读者介绍古典名著的宗旨,为大家阅读和利用《孙子集注》一书提供帮助,我们谨就上述问题作扼要的说明。

一、《孙子》的成书年代和作者

关于《孙子》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,学术界曾有分歧的意见,自宋代以来,争论辩诘已延续了千余年之久。论争的焦点,是其书成于春秋抑或战国?其书的作者是孙武还是孙臆?抑或如叶适所言,为某“山林处士”(《习学记言序目》卷四十六)?持否定意见的学者认为:孙武的事迹不见于《左传》等先秦典籍的记载,《孙子》书所反映的战争规模、运动作战方式、注重诡诈权变的特点以及专有名词(如主、将军等)的称谓、文体的风格均带有鲜明的战国时代特征。因此,《孙子》十三篇不可能成于春秋末年,而只能是在战国时期甚至更晚。它的作者也难以肯定是孙武,而当为其门人或再传弟子。有的学者则更断言为战国中期的孙臆。

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珍贵的竹简,其中有《孙子兵法》和《孙臆兵法》。0233号汉简上书“吴王问孙子曰……”;0108号汉简上书“齐威王问用兵孙子曰……”。两种兵法同墓出土,而两则简文的内容又恰与《史记》等史籍关于孙武、孙臆的记载相吻合,这证实了历史上孙武、孙臆各有其人,《孙子》的作者不是孙臆。肯定论者据此认为《孙子》成书年代与作者这一“千年聚讼”已“一朝得释”。然而否定论者却认为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,并不能完全解决其书的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,他们依旧坚持《孙子》一书带有浓厚的战国时代特征的基本观点(参见李零《关于银雀山简本〈孙子〉研究的商榷》,载《文史》第7辑;郑良树《论〈孙子〉的作成时代》,收入《竹简帛书论文集》等文)。

我们认为,《孙子》一书当基本成型于春秋末年,其作者当为孙武本人。具体理由有以下几点:

第一,孙武撰著《孙子》见于《史记》的明确记载。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云:“孙子武者,齐人也。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。阖庐曰:子之十三篇,吾尽观之矣。”这段记载至少透露了两点信息:1.

孙武曾著有兵法,并以此进见吴王阖庐并获重用。2.“十三篇”篇数与今传本《孙子》篇数相符。这是孙武著有《孙子》的最原始且有说服力的证据。

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记载:“白圭,周人也。当魏文侯时,李克(悝)务尽地力,而白圭乐观时变……故曰:吾治生产,犹伊尹、吕尚之谋,孙、吴用兵,商鞅行法是也。”白圭是战国前期人,他这里提到的“孙”,自是指孙武而非孙臧,这表明历史上孙武确有其人。《汉书·刑法志》云:“吴有孙武,齐有孙臧,魏有吴起,秦有商鞅,皆禽敌立胜,垂著篇籍。”又《吕氏春秋·上德》云:“阖庐之教,孙、吴之兵,不能当矣。”高诱注:“孙、吴,吴起、孙武也。吴王阖庐之将也,《兵法》五千言是也。”这里两则史料均明确指出孙武实有其人,并著有兵法。高诱更肯定《孙子》凡五千言,与今传本字数相近。其他像《韩非子》、《尉繚子》、《黄帝内经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论衡》等典籍亦有类似的记载。这些情况表明,孙武善用兵,撰著兵书乃是战国、秦汉时人们的普遍共识。

又,《银雀山汉墓竹简·孙子佚文·见吴王》及青海《上孙家寨汉简孙子佚文》均曾提到“十三篇”(“十三扁”),且《银雀山汉墓竹简·孙子》之内容与传世本《孙子》内容基本相一致。这样便从现代考古学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了孙子其人其书的可信程度。

第二,叶适、全祖望、陈振孙、钱穆、黄云眉诸人以《左传》不载孙武事迹,而断言孙武非《孙子》作者,或进而揣度孙武与孙臧为一人,或以为《孙子》成书于孙臧之手,凡是种种,多属猜测之辞。因为仅凭藉《左传》之记载有无而论定孙武与《孙子》的关系,其证据显然是贫乏的。这一点宋濂《诸子辨》中即有反驳。其要云:“春秋时,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策,不然则否。二百四十年间,大国若秦、楚,小国若越、燕,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,何独武哉?”至于混淆孙武、孙臧为一人,或言孙臧作《孙子》,这一误解已随银雀山汉简出土而澄清,毋需赘说。

第三,否定论者常就战争规模、作战方式、文体特征考论《孙子》书带有浓厚的战国色彩,进而判定其书成于战国年间,孙武非其书作者。我们认为这一观点也是无法成立的。首先,就整个作战方式演变看,春秋乃是一个过渡时期,其前中期与西周以来的“军礼”传统一脉相承;而自晚期起,则发生巨大的变化,反映为军队人数剧增,战争规模扩大,作战方式改变。仅就作战样式言,即是示形动敌、避实击虚、奇正相生等“诡诈”战法开始流行,过去那种“约日定地”、“鸣鼓而战”、堂堂之阵战法日趋没落。用班固的话,便是“自春秋至于战国,出奇设伏,变诈之兵并作”(《汉书·艺文志》)。《孙子》与“古王者《司马法》”不同,集中反映这一历史潮流趋向实属正常。其次,在这一时代变革中,南方地区的吴、楚诸国乃得风气之先者。当时这些较少受旧“军礼”传统束缚的国家,在战争活动中更多地采用了埋伏、突袭、诱敌等“诡诈”战法,并经常奏效。孙武曾在吴国为将,深受当地军事文化的影响,在其著述中自然要体现南方军事文化(包括战法)的特点。所谓“孙氏之道,明之吴越,言之于齐”(《孙臆兵法·陈忌问垒》)指的就是这层含义。所以,不能以战争规模扩大、野战机动性增强等现象来简单地和战国特征划上等号,更不宜由此而否定孙武的著作权。

第四,值得注意的是,《孙子》书中也明显带有春秋前中期战争的基本特色。如其言“合军聚众”,就反映了商周以来战争动员的主要特点。其言“穷寇勿迫”,其实就是早期战争“不穷不能”、“战不逐奔”的翻版。而其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全胜观念,则更体现了它与早期战争特征中广义一面的联系。众所周知,春秋前中期的战争更多的是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基本宗旨,因而军事威慑多于会战,真正以主力进行会战决定胜负的战争为数比较有限。换言之,当时大中型国家发生冲突时,多以双方妥协或使敌方屈服为结局,而彻底消灭敌方武装力量,摧毁对方政权的现象比较罕见。于是,会盟、“行成”与“平”,乃成为当时军事活动中的重要手段。公元前

770年,屈瑕率楚军大败绞师,结城下之盟而退还;公元前612年,晋攻蔡,入蔡,为城下之盟而退师。公元前571年,晋、宋、卫三国之师攻郑。冬,城虎牢,逼迫郑国求和;等等,都是这方面的显著事例。对这类传统的追慕和借鉴,遂构成《孙子》兵学的理想境界: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。其他如言兵种而未提及骑兵,言“仁”而未尝“仁义”并称以及“舍事而言理”的论述风格,均突出体现了春秋的时代精神。种种情况表明,《孙子》全书打上了春秋晚期社会变迁、军事斗争艺术递嬗的深深烙印,它只能成书于春秋期间。

当然,我们也不否认《孙子》书中有后人所增益的成分。如其“五行”观就有较明显的战国色彩;“焚舟破釜”等句颇可怀疑系后人窜入;而《用间篇》最后一段言“昔殷之兴也,伊摯在夏;周之兴也,吕牙在殷”云云,也与全书“舍事而言理”的基本风格相悖。然而所有这一切,均不足以动摇孙武为《孙子》作者,其书成书于春秋晚期这一基本事实。

二、《孙子》的著录、流传及版本

1. 关于《孙子》的著录与流传

据现存文献资料记载,《孙子》一书最早见于《史记》载述。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云:“世俗所称师旅,皆道孙子十三篇。”可见当时称是书为“十三篇”。此后,历代对其书均有著录。其源流大致如下所述:

西汉时期是《孙子》书正式见于著录的重要开端,也是其书基本定型和开始流传的关键阶段。当时朝廷对兵书进行了三次大的搜集和校理。第一次是汉初“韩信申兵法”、“张良、韩信序次兵法,凡百八十二家,删取要用,定著三十五家”(《汉书·艺文志·兵书略》)。第二次是在汉武帝时,“军政杨仆捃摭遗逸,纪奏兵录”(同上)。颜师古注云:“捃摭,谓拾取之。”第三次是在汉成帝时,“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,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,太史令尹咸校数

术,侍医李柱国校方技。每一书已,向辄条其篇目,撮其指意,录而奏之”(《汉书·艺文志序》)。在这三次兵书整理过程中,一定都包括了最重要的《孙子》一书。尤其是第三次,它对于传世本《孙子》篇名、篇次的排定,内容的厘正,文字的校定,具有重要的意义。这次校书之事,由刘向总其成。他曾为整理校订后的书作叙录,附于其书之中,上奏皇帝。叙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著录书名和篇题。根据其这一性质,我们可以推断《叙录》是古代目录书中著录《孙子》的第一部。刘向卒后,其子刘歆继承父业,“总括群书,撮其指要,著为《七略》”(《隋书·经籍志》)。因此,《七略》也当著录有《孙子》。同时,需指出的是,经过刘向、任宏的校书,《孙子》遂形成定本,并由国家收藏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源于刘歆《七略》,其对《孙子》有明确之著录,“《吴孙子兵法》82篇图九卷”,称“吴孙子”是为了有别于“齐孙子(孙臧)”。至于其篇数缘何由司马迁所言的“十三篇”(包括汉简本的提法)增至82篇,且附有图卷,原因不外乎二:一是自刘向到班固百余年间,人们对《孙子》不断增益的结果,使其篇数大大膨胀。二是因人们重新编纂篇次所致。我们认为,当以第一种因素可能性为大。故三国年间曹操注《孙子》,即指明宗旨:“世人未之深亮训说,况文烦富,行于世者失其旨要,故撰为《略解》焉”(《孙子注·序》)。汲汲于恢复《孙子》之原貌。

曹操之《孙子注》,系现存世的《孙子》最早注释本。其注简明切要,具有很高的军事学术价值,问世后即备受人们的称誉推崇。其注为三卷十三篇,正与阮孝绪《七略》著录《孙子》三卷相契合,这说明曹氏乃是就太史公所云《孙子》十三篇作注,至于孙子之佚文和他人所增附的内容则阙而不论。这亦从侧面进一步证实“十三篇”才是《孙子》的主体。曹操注《孙子》后,有《六朝钞本旧注孙子断片》,不知何人注本,日人香川默识《西域考古图谱》曾予收录。需附带指出的是,在两汉、魏晋南北朝期间,人们通常以“兵法”来

特指《孙子》这部兵书。其正式命名为《孙子兵法》当属隋、唐以后之事。虞世南《北堂书钞》、李善《文选》注均称引“《孙子兵法》”，即是明证。

《隋书·经籍志三》著录有“《孙子兵法》二卷，吴将孙武撰，魏武帝注，梁三卷”，“《孙子兵法》一卷，魏武、王凌集解”，“《孙武兵经》二卷，张子尚注”，等等。还提到了孟氏、沈友诸人注释解诂。由此可见，《孙子》在唐初已有多种注解本。但从其篇幅看（少则一卷，多则二卷），当未尝逾越“十三篇”的范围，或以曹注整理本为底本使然。

唐代以降，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，印刷技术的进步，《孙子》的流传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人们对《孙子》的尊崇有增无减，习学《孙子》成为较普遍的社会风尚。注家蜂起，各种单注本、集注本以及合刻本纷纷面世。尤其是在宋代，当时统治者有憾于国势积贫积弱，痛心于边患屡起迭至，出于扭转改变这一颓败局面的目的，便以较大的注意力投入于军事领域，提倡研读兵书，探求富国强兵之道。北宋神宗元丰年间，正式将《六韬》、《孙子》、《吴子》、《三略》、《尉缭子》、《司马法》、《唐李问对》诸书勒为一编，号曰《武经七书》，颁行于武学，为将校所必读。《孙子》自此而成为国家钦定的武学经典著作。此种情况一直沿袭至明、清而不变，如清代“武试默经”，依然是“不出孙、吴二种”（《武经七书汇解·吴子序》）。

与此相应，对《孙子》的著录也成为历代各类公私目录书编写时所关注的重点之一。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、《明史·艺文志》等“正史”，以及《郡斋读书志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《遂初堂书目》、《崇文总目》、《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等公私目录书，对《孙子》的各种版本、注家均有详略不同的著录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唐宋以来，为《孙子》作注者不下于二百余家，存世的亦在七十家以上。其中著名的注家，在隋唐时期有孟氏、李筌、陈皞、贾林、杜佑、杜牧等；在宋代有张预、梅尧

臣、王皙、施子美、何延锡、郑友贤等；在明代有赵本学、刘寅、李贽、黄献臣等；在清代则有邓廷罗、顾福棠、朱墉、黄巩等。可谓名家辈出，蔚为大观。

2. 关于《孙子》的主要版本

《孙子》书版本繁富，流传甚广，但穷本溯源，不外乎三大系统：

1. 竹简本；2. 武经本；3. 十一家注本。

竹简本。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《孙子兵法》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《孙子》最早手抄本。据专家研究，汉简本《孙子》陪葬的年代大约在建元元年（公元前140年）到元狩五年（公元前118年）之间。从字体风格来看，其抄写年代当在秦到汉文景时期，较历史上早期著录《孙子》的《史记》要早数十到上百。有的学者据此而论定汉简本与今之传世本相比，更接近于孙武的手定原本。我们认为，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，汉简本在校勘传世本《孙子》方面确有相当的价值，但却不尽全面。因为汉简本虽弥足珍贵，但终究并非完璧。且刘向、任宏诸人校书，乃是综合勘比众多《孙子》古抄本，多方征考，择善而从，而成定本的，其质量当较汉简本为胜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汉简本可资参考，然不宜过于迷信。汉简本的最佳整理本，系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《银雀山汉墓竹简·【壹】·孙子》。

武经本。即指宋刻《武经七书·孙子》。《武经七书》最早著录在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中，称之为《七书》，后因“武举以七书试士，谓之武经”。（见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十二《李卫公问对·题解》）宋本《武经七书·孙子》，是现存《孙子》的最重要的版本之一，原为陆氏丽宋楼藏书，后为日本岩崎氏购得，收藏在静嘉堂。今有《续古逸丛书》影印本。自宋代至明末清初，《孙子》书流传始终以《武经》本为主导。相对而言，十家注本的影响则比较微弱。与《武经》本有一定联系的是《魏武帝注孙子》，收录在清代孙星衍《平津馆丛书》卷一《孙吴司马法》内。它为现存的《孙子》最早注本，也是后世各

种传写本、刊刻本的祖本。有影宋本传世。有学者认为,它与武经本属同一版本系统,但年代更早,错讹之处也较武经本、十一家注本为少(见李零《银雀山汉简〈孙子〉校读举例》,载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81年第4辑)。历史上武经本系统质量上乘、影响广泛的研究著作主要有:金施子美《武经七书讲义·孙子》、明刘寅《武经七书直解·孙子直解》、明赵本学《孙子书校解引类》、明黄献臣《武经开宗·孙子》、清朱墉《武经七书汇解·孙子》等等。

十一家注本。即宋本《十一家注孙子》,上海图书馆藏本,1961年中华书局影宋本。它也是传世《孙子》书中的最重要版本之一,乃与武经本共同构成《孙子》书传本两大基本系统的源流。其书著录初见于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,《宋史·艺文志·子部》共著录三种《孙子》集注本,均从属于十一家注本系统。其中吉天保《十家孙子会注》当是十一家注本的重刻本。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,十一家注本在社会上并不十分风行。这种状况,一直到清代孙星衍手里才加以改变。当时他以华阴《道藏》本《孙子集注》为底本,对十一家注本作了一番认真细致的校订考辨工作,使之重新焕发青春,声誉鹊起,一举打破了自宋以来《孙子》主要以武经本流传的格局。孙校《孙子十家注》也就成了近世流传最广、影响最大、最敷实用的《孙子》读本。

三、《孙子》的思想特点和理论价值

《孙子》全书约五千九百余字,就篇幅言并不太长,但其文义精粹,内容丰富,是当时社会历史的产物,也是孙武本人对战争经验和军事斗争规律、特点的天才总结和揭示。其书对战争、战略、战术及治军诸问题,均有系统、精辟的阐述。

在战争问题上,《孙子》提出了以“慎战”、“备战”为核心的“安国全军之道”思想。它对战争持十分慎重的态度,开宗明义即表示“兵者,国之大事,死生之地,存亡之道,不可不察也”(《计篇》)。坚

决反对在战争问题上轻举妄动、穷兵黩武。强调“主不可以怒而兴师，将不可以愠而致战”（《火攻篇》），做到“非利不动，非得不用，非危不战”（同上），“合于利而动，不合于利而止”（《九地篇》）。同时要求加强战备，立足于有备无患，“无恃其不来，恃吾有以待之；无恃其不攻，恃吾有所不可攻也”（《九变篇》）。认为唯有“慎战”与“备战”并重，方可“安国全军”，在激烈的兼并争霸战争中牢牢立于不败之地。另外，《孙子》也高度重视政治清明与否对战争胜负的影响，注意到民心的向背问题，将“道”，也就是政治列为夺取胜利的首要条件。所有这些，都证明《孙子》对战争的认识已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
在战略上，《孙子》推崇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全胜战略，将其视为用兵的最理想境界。为此，《孙子》主张在战略谋划上做到胜敌一筹，这就是强调“知彼知己”，系统全面考察战争的主客观因素及其相互关系，提出了“校之以计而索其情”的著名五事、七计理论。在力量对比上争取占有强大的优势，即加强军事实力，造就“胜兵以镒称铢”、“胜于易胜”的有利态势；在战争准备上，做到周到细致，即“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”，“立于不败之地，而不失敌之败也”。在实行方式上，重视“伐谋”与“伐交”，即“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”，从而“必以全争于天下”（《谋攻篇》）；在作战行动上强调突然袭击，速战速决，即提倡“兵贵胜而不贵久”（《作战篇》），“夫霸王之兵，伐大国，则其众不得聚；威加于敌，则其交不得合”（《九地篇》）。在最短的时间里，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的胜利。《孙子》这一以谋制敌的全胜战略思想，曾对中国历代兵学理论的发展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。

《孙子》的作战指导思想是全书中最具特色的内容，也是孙子兵学理论的精髓之所在。在“兵者诡道”这一基本原则的指导下，《孙子》提出了一系列精辟、卓越的见解。例如主张争取作战主动权，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（《虚实篇》）；强调集中优势兵力，实施进攻